

#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因探析

刘正妙<sup>1</sup>, 彭 昕<sup>2</sup>

(1.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提倡并自己阅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原因在于:学习苏联经验并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创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试图纠正当时的混乱和错误思想。

[关键词] 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经验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6-0064-05

## The Analysis of Reasons for Mao Zedong Read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LIU Zhengmiao, PENG Xin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50's and the beginning of 1960's, Mao Zedong was very busy with work, but he still advocated and rea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 person.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to learn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o innovat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try to correct the jumbled and wrong ideas.

**Key words:** Mao Zedo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oviet experience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投身于只争朝夕的大跃进运动过程中,曾放下手头最重要的国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研读,并提倡其他领导干部阅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主要有:

### 一 学习苏联经验并总结自身经验

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很短,缺乏甚至是

没有经验。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sup>[1]241</sup> 1959年,他又多次提醒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刚刚起步,因此缺乏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也还不熟。这是我们的缺点和不足,要正视这些缺点和错误。<sup>[2]34</sup> 1960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也曾说,我们虽然干了十一年社会主义建设,“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sup>[3]301</sup> 即使到了1962年,他还是经常强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

收稿日期: 2014-04-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11JJZD002);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3C296);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1956-1966)”(13JD21)

作者简介: 刘正妙(1984-),男,湖南临湘人,湖南科技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彭昕(1986-),女,湖南湘潭人,湖南科技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经验”。<sup>[3]300</sup>

怎样才能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缺乏经验的状况?恩格斯将经验划分为两种类型:“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sup>[4]</sup>。毛泽东提出了与恩格斯相类似的观点。他通俗的将经验划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就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认知;间接经验是相对于个体自身之外的他人的经验。那么,我们获得经验的途径一般有两,即学习别人的间接经验和总结自身亲历的直接经验。

由于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的经验的东西”<sup>[5]</sup>,毛泽东认为学习兄弟国家的间接经验是获得经验的一条重要途径。在20世纪50-60年代,苏联作为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无疑成为了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毛泽东非常重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经验。“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主要的还是学习苏联。”<sup>[1]242</sup>毛泽东认为,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不少困难,但是中国比苏联要幸运。因为中国可以借鉴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更为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sup>[6]617-618</sup>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详细和全面地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经验。如处理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之间关系的经验,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经验,等等。这些问题大部分也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两本书,多次提到,我们搞经济建设,可以借鉴的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50-60年代,他曾经多次反复研读,并且发表了近5万字的谈话,并作了一些批注。但是,毛泽东并没迷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读书过程中,他认为,苏联“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观点有着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sup>[7]90</sup>所以,毛泽东提出,要联系中国实际去学习苏联经验。“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

好得多,容易懂”。<sup>[7]7</sup>他特别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方法只能是批判的方法而非教条主义的方法。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注意到了苏联经验之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特殊性,才使得他比较中肯和合理地估量和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学习到了不少好经验。

一个民族要获得经验,仅仅学习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自身实践总结直接经验。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点。“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史经验中产生的”;<sup>[8]271</sup>“《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sup>[8]506</sup>“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sup>[8]619</sup>在几次给各级领导干部的读书建议中,毛泽东认为有些党的领导干部整日忙于具体事务,不懂经济建设规律,像热锅上的蚂蚁,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很乱。所以,他提出,领导干部要放下具体事务,花上3至6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去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自身实践,思考问题,总结经验。

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学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sup>[2]276</sup>他对领导干部不注意总结经验,提出语气较重的批评:“我怀疑经济上的经验总结起来没有。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年一年过去了,经验可是总结不起来”。<sup>[9]464</sup>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的经验为主”。<sup>[1]353</sup>因此,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如关于反对官僚资本的经验,关于土改与合作化的经验、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验,等等,进行了新总结,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此外,毛泽东还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发表了长篇谈话,发言篇幅最长的,是对三面红旗大试验经验的总结(有1703字之多)。总之,毛泽东非常倾心于总结中国自身经验。只是,在总结自身经验时,毛泽东有些过度夸大了革命年代一些经验的普遍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如,毛泽东对待群众运动的经

验,就有些简单化看待的倾向。这也干扰了他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固守着某些不适用于中国客观实际的经验而忽视了苏联的一些好经验。也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没有走好“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条路。

## 二 创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缺乏理论准备,所以有些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sup>[10]43</sup>“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sup>[10]54</sup>他认为,一些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真正懂经济理论。<sup>[9]464</sup>没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可能要走很多弯路,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毛泽东经常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功夫学习理论知识:“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sup>[11]18</sup>“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sup>[10]51</sup>他常常以有无理论水平和理论水平的高低来作为评价事物和考察干部的标准。例如,毛泽东认为,人民日报的有些编辑头脑中没有理论的影子,他们很少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评价和分析事物,因此,他们编辑的人民日报只能算是二流报纸。<sup>[6]445</sup>又如,“我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内容看来,他是一个促进派,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风。”<sup>[11]368</sup>“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sup>[6]206</sup>

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在要求其他人提高理论水平的同时,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学习经济建设理论,想要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理论指导的现状。一方面,毛泽东从不断分析问题和总结经验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十分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能像民主革命阶段一样,对中国的新经验有所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展”。<sup>[12]316</sup>他常常试图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进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如为了从理论上回答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焦虑和困惑,毛泽东主持撰写和几十次修改《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他的两篇煌煌大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毛泽东通过不断学习马列著作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一般而言,人们对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三种可能的态度:一是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二是简单的抛弃马列主义,根据自己的经验制定行为方式的经验主义;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处理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虽不如在革命年代那样注重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也并非完全忽视其之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毛泽东经常思考理论在“什么意义上”或“那一层面”上具有“普适性”和“过时”与否的问题。他非常希望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现实,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sup>[7]48</sup>毛泽东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主要是想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写出新著作,形成能够指导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理论。“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sup>[7]48</sup>他认为,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然而,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遇到了许多问题。有着强烈责任意识 and 历史紧迫感的毛泽东认为党的理论创新迫在眉睫。“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sup>[7]48</sup>毛泽东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进行理论创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新的问题,所以1957年曾经多次提出:“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这样比较做国家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sup>[6]460</sup>虽然说,他不连任国家主席,有考虑国家领导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这与他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的估量也不无关系。“到了60年代,毛泽东已入古稀之龄,一方面感到人老体衰,精

力不济;另一方面,想总结新经验,写出新著作的雄心未泯”。<sup>[12]316</sup>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那么繁忙的岁月中,毛泽东放下手头最紧迫的工作来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他认为只有通过集中精力读书,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并自己身体力行地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想通过学习马列著作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进而进行理论创新。他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花园中的一枝奇特的花朵。然而,它能有效地指导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吗?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中国6万万人民群众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三面红旗大试验,然而,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是缺乏既成理论支持的,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虽然毛泽东经常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肯定三面红旗的成绩,但心中还是忐忑不安的。他急于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为了寻找和创新能够指导三面红旗大试验的理论。“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sup>[13]</sup>。他非常赞许和鼓励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从理论上分析和支持三面红旗大试验。如1959年8月31日,吴冷西给毛泽东写信说,《人民日报》近期将发表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毛泽东批示说“极好”。<sup>[2]483</sup>然而,毛泽东举起的三面红旗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因此,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虽然毛泽东针对三面红旗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要搞好综合平衡,多搞几个并举;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商品经济;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制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当时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明显地带有局限性,如否定物质激励的积极意义;迷信所有制不断变革;唯意志论思想浓郁等,这无疑误导了当时的建设实践。

### 三 纠正混乱和错误思想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许多人头脑中存在不少混乱和错误的观念。然

而,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人思想上存在问题。“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sup>[14]</sup>。毛泽东青年时期就认为思想问题是产生其它问题的根源,改造世界根本在于洁人之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工作。“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sup>[8]1657</sup>“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sup>[11]282</sup>他认为,思想问题,是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因此,每次制定重大决策和政策之后,毛泽东都会召开会议或到地方去大力宣讲,以期人们能够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产生社会主义建设强大动力。因此,在错误和混乱思想还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一直在努力地纠正混乱和错误的思想。

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党的三面红旗大试验开始全面实施。随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人们头脑中存在一大堆错误和混乱的思想。这引起了毛泽东高度关注。“大跃进把有些人搞的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许多人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现在有很多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很多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sup>[3]434-438</sup>“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们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sup>[3]10</sup>毛泽东试图纠正这些混乱思想。“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七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sup>[15]</sup>。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在党的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提出要防止和纠正三面红旗大试验中的“左”倾思想。从1959年3月9日至5月

2日,毛泽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写了6篇《党内通信》,其中都谈到纠“左”问题。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首次提出的。“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sup>[1]432</sup>确实,毛泽东通过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错误思想。

虽然毛泽东积极地纠正“左”倾错误思想,但这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坚持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sup>[2]522</sup>毛泽东没有意识到三面红旗大试验却是产生“左”倾错误思想的根源。其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认识是存在偏差的。他认为带有“左”倾错误思想观念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sup>[6]469</sup>而那些带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则“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sup>[6]469</sup>因此,毛泽东对带有“左”倾错误思想的人,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他认为有“右”倾思想或真正有“右”倾错误思想的人,则是猛击一掌,不轻易放过。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指出三面红旗大试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带有严重的“右”倾错误思想,从纠“左”直转急下地提出反“右”。改变了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初衷——澄清“左”倾错误思想,反而强调要重点批判“右”倾错误思想。加之庐山会议后,“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sup>[8]1013</sup>因此,在后来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毛泽东重点批判了所谓的“右”倾错误思想。只不过,他并没完全忘记三面红旗大试验中的“左”倾错误思想带来的危害。

在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为了尽早在落后的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国富民强之目的,赞赏并支持三面红旗大试验。这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和建设步伐,使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认识到党缺乏理论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毛泽东想通过读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做一理性思考,找出问题的症状所在,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社会主义建设回到健康迈进的步调上来。换言之,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他理想主义碰壁之后想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而做出的探索和努力。总之,由于在反“右”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理想性的维度往往强于现实性的维度,他本人也存在一些错误和混乱的思想,因此,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纠正混乱错误思想的效果是有限的。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3] 毛泽东文集: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61.
- [5] 毛泽东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8.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EB/OL].简本.[2014-08-16].<http://www.1949.gov.cn/uploadfile/ewebeditor/20110111092508676.pdf>.
- [8] 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9]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10] 哈尔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反修战斗队.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EB/OL].[2014-08-16].<http://www.1949.gov.cn/uploadfile/ewebeditor/20110111092119976.pdf>.
-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2] 石仲泉.我观毛泽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866.
- [14]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86.
- [15] 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24.

责任编辑:骆晓会